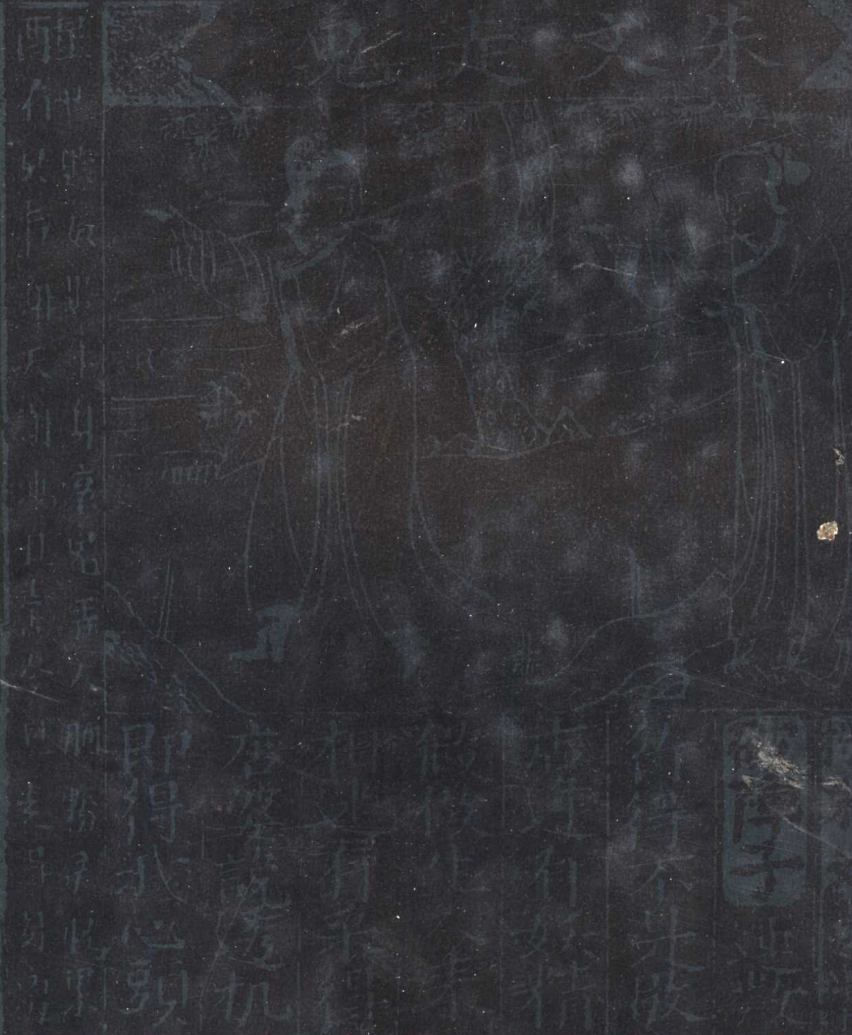


龍波得輯

明閩戲絃管
刊南曲本
三種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龍波得輯

明刊閩南戲曲絃管選本三種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編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京)新登字 15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刊闽南戏曲 弦管选本三种/龙彼得辑;泉州
地方戏曲研究社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 年
ISBN 7—104—00707—5

I. 明… II. 龙… ②泉… III. ①闽剧—艺术—研究②
闽剧—剧本—明代 IV. J825.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532 号

明刊闽南戏曲 弦管选本三种

龙彼得 辑

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

责任编辑: 杨锦海
郑国权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泉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

250 千字 1092×787 毫米 1/18 开本 印数:1000 本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104—00707—5/J. 319 定价:45 元

被遗忘的文献

龙彼得著
胡忌译

引言

这里提供的三部中文书在中国是不为人知的。这些孤本是三百年前作为古文物被人带到欧洲，且一直未被正式鉴定过。它们刊印于十七世纪初，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用闽南方言的早期文学的罕见例证。其中带插图的一本有完整的折子戏和多首散曲与今天仍然在上演的传统梨园戏为同一类型。其他两本是散曲选录，大部分也是来源于舞台演出。这样，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二十六出戏的痕迹，其中有几出已不复存在。有的在中国任何场合都没有记载。许

* 本文为龙彼得先生所著《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明刊三种选本之研究》（刊在龙彼得辑《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台湾南天书局一九九二年五月出版）之第一章。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请胡忌先生翻译，后经龙彼得先生修订。龙先生同意本章连同「明刊三种」一并出版。

多曲子则一直原封不动地在当地音乐社团的南管传统中保存下来。

在福建本省讲闽南话的约有一千一百万人，估计在台湾有一千四百万，东南亚约有五百万。福建其他的居民不懂闽南话，何况讲官话的人。现在通称为「闽南」这一地名可以引起一些混乱，因为语言学家常以它的广义概括广东东部，即使用和它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潮州。在东南亚，人们则用 Hokkien 一词，它实际上指福建全省。本论文中这两个词都指它的狭义。而代以另一名称厦门是不合适的，它只代表闽南方言中的一种。早在四个世纪之前，这里主要的方言是以泉州和漳州为首府划分的两个政区的两种方言^②。

最古的闽南话剧作是《荔镜记》。写陈三和五娘的故事，有一五六六年闽北建阳余氏新安堂刊本^③。它的全称是《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尾页告白说明它是早先《荔枝记》的重刊本。此剧具有潮州和泉州的色彩，但本子里特别刊明为潮州腔的只有九支曲牌，这就意味着所有其他的曲牌都出自泉州。全本始终均有插图，上栏还提供另一部闽南戏《陈彦臣》的大量唱词^④，以及正音短剧题为《勾栏》和主要出自《西厢记》的其他正音曲。此书有一本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Bodleian)图书馆，另一本则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⑤。

《荔镜记》的宾白风格简明，并经常采用方言俗字，说明该书并不是第一部使用闽南话的文学作品，而方言文学早在一五六六年之前就已出现。加之，这类书籍显然是有市场的。当时的识字率很高，譬如在一五八九年传教士噶玛噶(Juan Cobo)说马尼拉的中国移民「一千人中有十个不认识很多字的」^⑥，这大概是夸大的说法。更能表明方言俗字的常用是，约在一六零零年后不久，马尼拉有一位叫 Keng Yong 的刊行一本用闽南话写成的《Doctrina Christiana》(基督

教义)②。

除《荔镜记》与收入本书重印三部选本以外,有关明代闽南方言文学尚无所知。但我们还必须

① 有关一六零零年左右通行的闽南方言以及其他语言学的问题,可见 P. van der Loon(龙彼得),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马尼拉古版本与早期研究闽南语之概述),
《Asia Major》,N. S. 12, 1966, 1—43, 13, 1967, 95—186。我采用的音标系统在该文第二部分,页一
零八至一零九,作了解释。

② 有两篇很有用的关于余氏的研究及其长达几个世纪的刻印活动的论文:官桂铨的《明小说家余
象斗及余氏刻小说戏曲》,《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五辑,一九八三年,页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三十,萧
未发的《建阳余氏刻书考略》,《文献》21, 1984, 230—247; 22, 1984, 195—219; 23, 1985, 238—250。
两位学者竟能查证《书林余氏重修宗谱》这一八九六年新安堂出版的重修宗谱。新安堂显然是
余氏祖祠的名字,余氏为新安郡(即徽州)大族之一。一九八零年八月五日,我把另三本新安堂印
行的明版书的详细资料提供给饶宗颐先生,他有意把它们收入在他编的《明本潮州戏文五种》的引
言里(参见本文注解四)第七页。第四本书是《四书程墨会元全》,据牌记,由余氏新安堂苍泉于一
五八八年印行;牛津博德利图书馆藏有不完整的一本。

③ 此剧在后第五章(译稿待定)之末加以讨论。

④ 吴守礼于一九七零年缩印了牛津本,附标点文及校勘记,收入他著《荔镜记戏文研究》(台北东方文
化供应社,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第七辑)。天理本已收入《明清闽南戏曲四种》中,由吴守礼和
林宗毅于一九七六年私印出版,又收入一九七八年的《定静堂丛书》。但更好的影印本收入《天理
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十卷,一九八零年天理大学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出版的《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即用此版本重印。

⑤ 见 Antonio de Remesal,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 S. Vicente de Chyapa y Guatemala de la Orden
de nuestro glorioso padre Sancto Domingo》, 1611 年马德里, 页六百八十六。

⑥ 唯一为人知的印本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在拙作《马尼拉古版本》(见本文注解一), 页十一至二十
五, 页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八十六中有详细介绍, 并附录中文与在同时期的抄本中发现的罗马字体
文。

须提及潮州有两本罕见的书也一直保存在国外。第一本为《荔枝记》，写陈三与五娘故事的剧作，由潮州东月李氏编集，李氏的名不详。该书全名是《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亦如书名指出，书有插图，「乡谈」就是「方言」的通称。书四卷，有三卷的标题为「书林南阳堂叶文桥绣梓」，但牌记曰「万历辛巳岁（一五八一年）冬月朱氏与畊堂梓行」。叶氏与朱氏是建阳的有名刻书家，也许此书原为叶文桥所刊，版片后为朱氏所有。唯一保存的一部藏于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即维也纳纳宫廷图书馆的后身。一九六四年我找到这个珍本。

另一本明代潮州作品是《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收有《金花女》的选段。此本无刻书人名及年月，其版式似十七世纪初叶的刻本。书三十四页，其中的第二十五至二十六页已丢失。本子上栏有另一出戏《苏六娘》的选段。此书唯一的一部原为长泽规矩也所有，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简述一下明代以后的现存闽南方言文学也许是有用的，尤其是在下面的章节里不时要提到这些资料。

戏曲——梨园脚本是口传的，现知只有三个印本：《新刊时兴泉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一六五一年人文居梓行；《同窗琴书记》，一七八二年会文斋刊行；《绣像荔枝记真本》，一八四四年三益堂刊行（又一九一一年泉州绮文居石印）。一六五一年的《荔枝记》只收有很少的潮调曲子，与一五八一年潮州本相比，它更接近于一五六六年的《荔枝记》。一八八四年的三益堂本同收此戏。两者以及《同窗琴书记》都编得很粗疏，印行也拙劣。每个本子的目录与本文不符，往往刊落曲牌，插图也很粗糙。

散曲选集——许多选集的手抄本是由南管社团传下来，但在发现这些目前影印出来的明

代本子之前，古代刊本都不为人知^⑤。

提线木偶戏——这都是木偶戏演员为演出时用的抄本。最著名的是泉州傀儡戏。这些本子在文革时被毁了，现在又有一部分重新编出来，但至今还未见出版。

掌中木偶戏——在闽南被称为布袋戏。我不熟悉这些戏使用的手抄本，但我可以提及一本奇特的书，即《新刊宣讲戏文》，收有九出短戏，是一八八六年东局诸同人集资刊本。序曰：「演剧之最宜淫者，莫如掌中班。……青年士女观者，罔不心动焉。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前经官绅禁约，无可如何。兹本局诸同人，就宣讲堂合撰数段，皆有关于家庭，有关风化，能使士女观之，触目而惊心。」

皮影戏——现在仍在台湾高雄县上演。可以证明这些戏大概源于漳州南部地区，那里的方

⑤ 与畊堂印行书籍的日期为一三九五至一六零八年之间。南阳堂为叶家的祖先祠堂，因为叶氏是南阳郡之名门。

⑥ 吴守礼于一九六七年前私下发行了一本附校勘记和分类词汇的油印本。《明清闽南戏曲四种》（一九七六）收有很粗劣的影印本，另在《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一九八五）中重印出来。

⑦ 在《明清闽南戏曲四种》及《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中影印。两剧的标点文，连同吴守礼所作的校记、韵字表及字汇于一九七二年发行（台北东方文化书局，民俗丛书第七十九至八十册）。在汕头的广东潮剧院于一九七九至八十年间发行过油印本。

⑧ 有关《同雷琴书记》请看拙文第四章「祝英台」（译稿待定）。吴守礼于一九六八年曾发行过附标点、校勘记和词汇的一六五一年版《荔枝记》的油印本，原书在《明清闽南戏曲四种》中影印过。一八八四年版《荔枝记》的影印本，附吴守礼的校本及词汇于一九七八年发行，又收入在《定静堂丛书》里。二十世纪出版的南管集和曲谱在拙文第三章（译稿待定）中介绍。

言接近潮州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收集者买到大量的皮影戏写本，最早的是一八一八年^⑤。至今只有一剧本校勘和出版^⑥。

歌册——所谓歌仔簿，包括叙事性民歌和说教与谐谑小唱。其中有男女轮流对唱的。最早的歌仔簿传本是一八二六年，仅是印成几页的小册子，但到本世纪福建（在台湾则直到三十年前）仍有人编述和出版^⑦。可惜设有可靠的依据证明这些歌怎样唱或诵。潮州的叙事性歌册则长得多，且印刷也较精致，现在还可听到有的妇女会吟诵这些歌。

法事戏与对白——法事戏是由道士或和尚为超度死者灵魂而举办法事时所表演的。在阴间过桥仪式上或打地狱时要有幽默的或悲喜交集的对话，有时有一个或更多参加法事的女道士会戴上面具。涉及道德说教的戏不是在台上演出而是在地上，包括《目连救母》、《三藏请经》、《孟姜女》和《朱寿昌》等片段。本子通常每一代由一位年轻道士抄写一次。

巫术文学——《路关簿》大概是巫术文学最好的范例。《路关簿》包含进天曹、落地府、探五岳、游水府、往扬州（饿鬼的地区）、探血湖、入花园的阴间历程。我曾看过演出，这些历程由三个童乩任扮演者，每人打出一面旗，其中一人骑在「马背上」。三个童乩都由一个道士指挥，他诵出他们所见的情况^⑧。据说这种仪式主要在同安或为同安人而举行的。我考查过的手抄本都相似。

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本子都是为了演出之用的，不论是戏曲、散曲、歌谣或宗教仪式。实际上仅有一种是属于散文创作，即泉州人杨介人的《畅所欲言》^⑨。至于基督教传教士出版的文学与圣经译本，全无中文方块字的罗马字体以铅印成书的，这里自毋须叙述了。

古代中国，掌握文言是进入宦途的先决条件，白话文学则被人蔑视。官话也正如是，但南方地区的「俗」方言更受藐视。到本世纪，由于教育渐趋普及，官话已作为文化工具代替了文言，结

果是福建和台湾用的闽南话现只限于口头用词而没有独立成文学。除了道士和演唱南管的，能熟悉自己家乡话传统文字的人已寥寥无几。

在经历了无意轻视和有意破坏之后，泉州和漳州的文化遗产已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中国不再有明代或清初版本的闽南方言作品了；如果无欧洲和日本图书馆里偶或发现的本子，我们甚至不会怀疑早于十六世纪即有方言剧本的印行。

《荔枝记》（二五六六）、《荔枝记》（一五八一）以及目前所述的三种作品被保存至今完全属于偶然。在西方人取得了这些作品之时，中国没有人认为它们特别重要。明代，被带到欧洲的书籍，都是普通、甚至是俗劣的版本，任何中国学者都不屑于收集。相反，在西方虽然没人认识

① Kristofer Schipper, *Une collection de manuscrits de pièces de théâtre d'ombres chinoises*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第二辑，一九七九年，页七至七十二。我们应该考虑皮影戏的剧本原来跟四平腔有没有关系。

② 请看拙文第四章（译稿待定）有关「宋文」部分。

③ 牛津博德利图书馆藏有最古老的歌仔册十九本。与中国学者得知的情況相反，这些书籍不是伟力（A. Wylie）藏书的一部分，而是在一八四九和一八七六年间通过无人知晓的来源获得的。大部分现存的清代本子都在李献璋（现存せる清末の闽南歌謡集）、《华侨生活》第二卷，第八号，东京一九六三年，页七至十四中介绍过。施博尔（K. M. Schipper）编了《五百回本「歌仔册」目录》、《台湾风物》第十五卷，第四期，一九六五年，页四十一至六十，多数是日本占领时期的铅印本。Wolfram Eberhard, *Taiwanese ballads: A catalogue*（台北一九七二年，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第二十二辑）专主战后出版的歌册。

④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融中就这种仪式。马是用有流苏的马鞭作象征，与舞台戏中所用类似。

⑤ 此书内容有幽默的赋、散文和泉俗语对。作者序写于一九零七年。我存有一本绮文居一九一七年出版的石印本。

其中一个方块字，藏书家、国王和大学的图书馆却把它们奉为珍品^⑤。于是一部作品往往被不同的收藏家拆开^⑥。除天主教译本外，我估计在一七零零年前被带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于今还有三百本藏在各图书馆。有许多书已不完整，偶或被人检出来的大部分是中医论著、儒家经典或其他令人不大兴趣的作品。

真好不容易，我们在一卷原来漠然列为「中国书籍」（或「中国插图本」）书中找到那个把它从远东带回的人的名字。例如在西班牙的爱斯科里亚尔图书馆，有几本中文书，其中就有珍贵的一五五三年版《风月锦囊》。这是葡萄牙传教士 Gregorio Gonz Ivez。他曾在澳门传教十二年，后来又去过摩鹿加群岛和菲律宾，在《风月锦囊》就是他委托在里斯本的西班牙大使 Juan de Borja 于一五七三年献给西班牙王的礼物^⑦。

在十七世纪之后，这类文物看来主要由荷兰人提供。一六零五年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名书商 Cornelis Claesz 在法布里克福秋季书市上出售一批书籍时这样说：「一批各种中文书籍，即今首次从中国带来的书，纸墨皆珍异。」^⑧此后不久，中国书籍就在荷兰的私人藏书目中载入数次^⑨。在一六二二年之前，荷兰几乎没有和中国发生直接关系，这些书约是由中国商人先运往了印尼群岛，然后在那里被荷兰船员买去了。也许进一步的研究能把这个问题考查清楚。

新发现的选集

在阐述了这三种选集历史背景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详细的介绍了。

一、《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卷末莲牌木记曰：「岁甲辰瀚海书林李碧峰陈我含梓」。书的扉页大字书名则为《刻增补万家锦队满天春》，中间嵌有「内共十八队俱系增补删正与

坊间诸刻不同」字样。

二卷，每卷名义上四十页，但下卷有一页版心标出三十六至三九。四周单边，长阔一百九十二乘一百二十毫米，每页分二栏：下栏十行，每行十六字，有插图，上栏十二行，每行九字。

① 第一次尝试编中国书目是在十七世纪末。一六八三年 Andreas Müller 把柏林勃兰登堡选举侯的书籍列出名目，一六八七年，Thomas Hyde 由沈福宗（教名迈克尔）协助把博德利图书馆各种更多的藏书书目编出。

② 例如《三国志传》一五九二年建阳版，卷七至八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而卷九至十则藏于德国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州立图书馆，卷十一至十二又存于博德利图书馆，卷十九至二十存于大英国图书馆。其余十二卷至今未找到。

③ Gregorio de Andrés, <Los libros chinos de la Real Biblioteca de El Escorial>, 《Misionaria Hispanica》卷二十六卷，一六六九年，页一五至一五二一。

④ 见 Bert van Selm, <Cornelis Claesz's 1605 stock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Quaerendo》第十三卷。一九八三年，页二百四十七至二百五十九。他认为书市正式印出目录中这广告即为存货书目的介绍。但 Claesz 用「一批书籍」一词而不用普通的「书目」。并且那时欧洲没人会把任何一本中文书名译出或口译出它的主题。据 van Selm 这些书籍大概是一六零三年被荷兰人拦截的葡萄牙大商船凯达琳娜号所载的一部份货物，提出这个论点很有趣，但这仅仅是几种可能性之一。

⑤ 见前所引 van Selm 的文，页二百五十七，及同一作者的《Een menighe treffelijke Boeken: Nederlandse boekhandelscatalogi in het begin van de zeventiende eeuw》，一九八七年乌得勒支，页三百七十七至三百二十八，页三十三。我加上 Thomas Erpenius (一五八四至一六二四) 的藏书中也有一本中文书，在 Gerard J. Vossius 的《Oratio in obtum clarissimi ac praestantissimi viri, Thomae Erpenii, Orientalium linguarum in Academia Leidensi Professoris》(莱顿一六二五年) 附录的书目中被介绍为「Liber chinensis characteres chinensi in papyro duplicata byssina」(papyrus byssina 即棉纸)。这部藏书是白金汉公爵 George Villiers 买来，由他的遗孀于一六三二年赠给剑桥大学的，至今仍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即《丹溪心法附余》卷二十二至二十三，在欧洲其他图书馆中也能找到更多的残卷。

一七一五年以来此孤本一直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这是 John Moore (一六四六至一七一四) 所藏的四本无名「中国书籍」之一。Moore 为英国诺里奇主教, 后为伊利主教。他这部藏书由 Edward Bernard 列入著名的《Catalogi librorum manuscriptorum Angliae et Hiberniae in unum collecti cum indice alphabetico》(全英国与爱尔兰各图书馆藏抄本目录), 一六九七年牛津版, 第二册第一部, 三百七十八页。Moore 的藏书和旧抄本由英王乔治一世捐赠给剑桥大学, 但当时中文书和旧抄本放在一起, 迟至一七五三年才编入书目。由于没有人懂中文, 这本选集就归入 Ff 1. 10 架号, 简单地标出「中国刻印书, 小型对开本」。一九一五年 Herbert A. Giles 在他编的《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及满文目录补编) 中用了新(现已不用)架号 E 568 很不准确地说明这一本书的内容^③。Moore 如何获得这些中文书至今尚无人知。

上文引到的牌记文字并未说明这本选集是何时何处刻印的。瀚海不可能是一个真的地名, 而甲子纪年的甲辰可以是一五四四、一六零四或一六六四年。不过分别由李碧峰和陈我含刻印的其他两本书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本是蒋孟育(一五五八至一六一九)的《翰林院校阅训释南北正音附相法官制算法》, 据卷末牌记澄邑李碧峰于一五九五年刊行, 而扉页作「瀚海李碧峰刊行」(图一、二)^④。另一本是福建左布政使司范涑(一五七四年进士)发行的《范爷发刊士民便用家礼简仪》, 是和《汇选海内名家翰墨纂》于一六零七年澄邑陈我含梓行(图三、四)^⑤。澄邑即海澄的通称。由此可下结论: 该选集(此后我简称之为「满天春」)是由海澄两名刻印者于一六零四年发行的。瀚海一词在明代书籍中意为「海洋」, 也许竟用作海澄的雅名^⑥。(图刊于原书十一页, 附于本文之后。)

二、《集芳居主人精选新曲钰妍丽锦》，书林景宸氏梓行。别题《精选时尚新锦曲摘坠》（坠当作队）。

存三十一页，缺最后第三十二页，前另有四页是目录和序曲。四周单边，长阔一百一十一乘八十三毫米，正文每页九行，每行十六字。扉页有简称《钰妍丽锦》，上有图：三个女子在吹箫、弹琵琶和拉二弦，下有两瓶花，显然为梅与兰。此孤本自一七五三年始藏于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在德累斯顿（原名选举侯宫廷图书馆）。

三、《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玩月趣（闽南话「趣」同音）主人编辑，霞漳（漳州的别称）洪秩衡梓行。别题《新刊时尚雅调百花赛锦》。版心署《赛锦》。

三卷，是「二卷」、一卷及二卷，原数分别为二十、八、七页，另外最后一页缺失，有四页目录。四周单边，长阔一百一十一乘八十五毫米。正文每页八行，每行十七字。无扉页。此孤本自一七五三年始藏于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在德累斯顿。

① 在英王捐赠 Moore 主教所藏的四本「中国书籍」（其中一本是日本书）之前，剑桥大学图书馆在一六三二至一六六四年间的不同日期里已获得四本中文书。其中一部自一七七五年就不见了。

②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一九八一年版，页五百九四。

③ 东京尊经阁文库藏本，见《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页三百一十五。仁井田升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一九六二年东京，页七百八十五至七百八十八，中有详细介绍。

④ 当然更为人所知的是瀚海指中国北方某一实有或虚指之地。

这两部选集已装订在一起，书架号为Eb 428^⑥。它原为 Siegmund Gottlieb Seebisch（一六六九至一七五三）的私人藏书，一七零八至一七四六年他任图书馆管理员。选集前页有拉丁文记着书的内容：「汉诗集，一六一三年版」，后来字迹被划去。德累斯顿图书馆的领导曾好心地告诉我，这一字条似乎是一八一四年第三等秘书 Friedrich Adolf Ebert 所写。他在一八二五年任该馆管理员。选集中还有另一字条，把书名音译和意译出来，但是都错了。译文载于 H. O. Fleischer 的书目《Catalogus codicum manuscriptorum orientalium Bibliothecae Regiae Dresdensis》（德累斯顿王家图书馆藏东方抄本目录）来比锡一八三一年版，七十一页。Ebert 还在此处述馆藏几本中国书的解题是从 Klaproth, Montucci 和 Staunton 获得。我们不清楚这三位学者中是否有一个对第一字条说明负责，尤其是肯定它为「一六一三年版」。这详细的说明可在卷末牌记文字中看到，但因为两部选集的末页都已佚失，这又引出另一问题：它们是如何失却？令人奇怪的是，据 Ebert 说（见致 Fleischer 书，前言，第 v 页）Seebisch 一六九七年在莱顿，曾在那里书籍拍卖中买到几本 Jacobus Golius（一五九六至一六六七）留下的书。既然大部分的中国书是由 Edward Bernard 代表 Narcissus Marsh（一六三八至一七一三）买到的，那么这两部选集在那批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中文书之内的可能性即很小。Marsh 后任爱尔兰阿马郡大主教，死后将他的东方抄本书遗赠给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⑦。

我们虽不能查证这一本或两本书是在一六一三年刊行，但书的字体表明它们是明版。尽管表面上相似，它们相互间内在的联系又能辨认出来。每一选集都有自己的目录。编者、刊行者以及行距框格均有所不同。只有一本在版心使用简化的书名和曲文旁缀了音乐节拍的符号。最后，如附表（见文后）表明，两书有重复之处，第一本五十二首曲子中有十四首在第二本中可找

到。本文中我宁可采用有诗意的书名《钰妍丽锦》和《百花赛锦》而不用它叙述内容的书名^⑤。《百花赛锦》的书名既不统一，卷数也不规则，这也许反映了它汇刻时编辑计划的改变。然而它的目录是完整的，简化书名的出现贯穿始终。为方便起见，我在复印本的边上注上真正上、中、下的卷数区分并用一、二和三的数字作引用。

正如前述，《荔镜记》是在建阳刊行的，该地以出版大量坊本和通俗书籍为全国广大读者之用而闻名。这三部闽南戏曲选集在福建南部刊行：《百花赛锦》、大概还有《钰妍丽锦》在漳州，《满天春》在海澄，离漳州东南约二十四公里。海澄原叫月港，当时为一繁华城市，是中国对吕宋与爪哇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⑥。今天，它已不是县府所在地^⑦，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市镇，昔日的重要性几乎被人遗忘。

① Walter Fuchs, *Chinesische und mand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第十一卷·第一册)，一九六六年威斯巴登，页五十六至五十七。

② 拍卖是在一九九六年十月而不是一九九七年举行的。当时印行的书目曾在 J. J. L. Duyvendak (早期汉学在荷兰)，《通报》三十二卷，一九三六年，页三百一十四至三百十六，一文中作为介绍中国书籍。以「中国印行的书籍」为题，记录了十九种。其中有十三种重新出现在 Marsh 的藏书目录里，收入 Bernard 的《抄本目录》第二册，第二部，页六十五，除一种外，其余全和拍卖书目用字相同：一至四，九至十三，十五，十六 (Bernard 称之为「地理书籍」而不是「中国哲学」，它实际上是有关古希腊托勒密天文学的一本书)，十七，十九。其余六部由谁买去，不得而知。

③ 我们在《满天春》中已见到用诗意与叙述内容相结合的书名，这是明代戏曲选本的特点。由于马尼拉的海澄商人与西班牙人的交往从而提供的重要资料，使我们拟定一六零零年左右实用的海澄方言语音系统：见拙作《马尼拉古版本》(页一百零九至一百三十二)。

④ 龙溪和海澄两县在一九六零年合并为一个龙海新县，其驻地石码，位于海澄西北五公里。

附表 《钰妍丽锦》中收有的《百花赛锦》散曲

钰妍丽锦	曲名	百花赛锦
一页背面	纷纷如醉	一卷十九页背面
四页背面	关山万里	一卷三页正面
七页正面	孤栖人平	一卷三页正面
十六页正面	盘山过岭	一卷十八页正面
十七页正面	拙时无意	一卷十五页正面
十七页背面	点点红花	一卷十七页背面
廿一页背面	凉亭杨柳	一卷十七页正面
廿二页背面	鹅毛雪落	一卷十六页正面
廿四页正面	自许时分	一卷四页正面
廿六页背面	朱郎卜返	三卷二页背面
廿八页背面	接着封书	一卷十三页背面
廿九页正面	来到西厢	一卷十九页正面
廿九页背面	记得共君	一卷十四页正面
三十页背面	我只处心	一卷一面正面